

##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

2006-12-22 欧兵 阅读496次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武装斗争的党变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把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弱的国家变成当今世界综合实力靠前的强国。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对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新中国政权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无疑可以为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 一、根据地红色政权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

毛泽东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始于井冈山时期以及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并在延安时期进一步完善。毛泽东在红色政权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政策。土地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者和执政者都无法回避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立三路线”无视中国国情，超越民主革命阶段，机械照搬俄国革命“土地国有”、搞大规模集体农场的错误做法，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坚持土地归农民所有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分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针对“王明路线”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毛泽东提出限制富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消灭地主阶级，给地主分配和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扭转了王明“左”倾路线给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

第二，重视抓经济建设，把它作为军事工作和巩固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把根据地经济问题的解决提出来，并摆在军事问题之前，希望引起“每个党员注意”。1933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党内忽视经济建设工作的“左”倾思想，指出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如何抓经济建设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加强根据地物质流通和进出口贸易、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在每个县设立粮食调剂分局，在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设立粮食调剂支局等）。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首次阐述了党在根据地政权的经济政策，指出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在延安时期，为打破蒋介石集团对延安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身体力行，带头垦荒种地，组织军民大生产运动，终于发展了边区经济，巩固了红色政权，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第三，探索民主政体，建立人民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创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这种政权的人员构成原则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政权的选举政策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政权组织由参议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两部分政权组织都是民主选举产生，先通过民主

选举产生参议会，再由参议会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和政府组织机构(这成为以后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对这种“三三制”政权组织，毛泽东还在《论政策》中特别强调指出，“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固然是由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使然，但也与毛泽东的民主执政理念有着深刻的必然联系。早在辛亥革命时，青年毛泽东就对英、日的立宪制十分推崇，并发出“今日之中国，应像英日等国一样，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的感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岁月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建立人民政权。1922年，毛泽东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即成立了“十代表会议百代表会议及全体总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权颁发行政令，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政权。此后，毛泽东又相继领导成立过“农民协会”(1925年)、“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1930年)、“边区参议会”(1937年)、“人民代表大会”(1945年)等人民政权。政权归民，执政为民，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一党私利，这样的执政理念使毛泽东胸襟宽广、虚怀若谷，这可以通过延安时期的两件小事反映出来：一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给本就贫寒的当地群众增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引起部分群众对军队和政府的不满。一日，有个老乡的驴被雷电劈死了，发牢骚骂道：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偏偏把我的驴给劈死了?!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有人主张把这个老乡给抓起来。毛泽东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高兴地说：好啊!从来都是老百姓怕官、怕军队，现在老百姓敢骂我、骂军队，这说明我们的“民主”已深入人心了。不过，我们得想办法，减轻群众负担，搞好军民关系。受曹操军队“屯田”的启发，毛泽东发动了军民大生产运动，大大缓解了边区的经济压力，减轻了群众负担。此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军民开展了一场“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第二件事是米脂县开明士绅李鼎铭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给共产党提出“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欣然采纳，并在这次会议上选举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事情虽小，寓意深长，它说明只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能“胸底无私天地宽”，赢得民心，巩固政权。

第四，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积极追随参与新文化运动，在根据地执政后更是注重新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高度评价：“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立场、方向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在延安地区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到1945年，已有干部学校30多所，中学7所，小学1395所，还有各种识字班、夜校等，延安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极大发展。全国不少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纷纷汇集延安，使延安知识界、文艺舞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极大地宣传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五，重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历代王朝盛极而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自信找到了新路，那就是：加强执政党建设，让执政党处于全民监督之下，走民主政治之新路。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十分丰富，他最为重视的就是如何防止执政党的腐败问题，这是防止“政怠宦成”、避免历史“周期律”重演的关键。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警惕敌人“糖衣炮弹”进攻并提出“两个务必”，到1949年进北京之前自喻为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防止执政党腐败思想十分丰富且为大家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 二、新中国冷战时期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27年，本文概括为“冷战时期”，主要是想突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是与当时东西方长期敌视、对峙的国际大背景分不开的，离开这个时代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所想、所为。概括新中国前27年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及实践探索，可谓有得有失。其成功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未雨绸缪构思了全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蓝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稳固了政权、安定了秩序、恢复了经济、繁荣了市场,并成功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能力和安邦治国的风采。

第二,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独立自主是毛泽东一贯的理念,坚持独立自主,我们不仅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封锁和武装挑衅,也摆脱了成为前苏联“老大哥”、“老子党”的附庸,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除苏联外都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迷信苏联模式、效仿苏联模式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毛泽东敢于逆历史“潮流”,提出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对苏联模式暴露出的问题要“引以为戒”,“少走弯路”,不能不说表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政治勇气和独到的执政理念。毛泽东多次向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首脑讲过,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完全的民族独立,就会成为经济大国的附庸。所以毛泽东始终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放在首要位置,提出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写下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等名篇,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知识分子问题等,比较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执政建设理念和思想,其内容丰富,见解深刻,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财富。如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中“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外关系上“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方针、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提出的社会主义综合平衡规律等,至今仍然不失其价值。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并于7月13日致信毛泽东:“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第四,作出了向科学进军战略部署,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夯实了科技基础。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科技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提不上议事日程。1955年初,毛泽东提醒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毛泽东提议下,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毛泽东也亲自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会后中央即任命聂荣臻元帅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调集了600多名科学家和邀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花了半年时间编制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引起全国知识界强烈反响,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一大批海外科技人才,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我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等,他们冲破各种阻挠,先后返回祖国,报效祖国,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党风政风常抓不懈。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全面执政后当然更是高度重视。如在1951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被判死刑,就显示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毋须讳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探索也给我们留下沉痛的教训,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轻视甚至无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终于酿出“大跃进”运动的苦酒,而“大跃进”的幻觉又催生出了“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所谓农村共产主义萌芽组织,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一段曲折。

第二,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民主片面视为“还政于民”的“无法无天”的“大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观为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播下了“种子”。

第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错误。本来,党的八大决议已把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却在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指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倾”以及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与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判断错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毛泽东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新中国政权建设中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并从反面促成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欧兵,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